

王绍鏊纪念集

7.7

江苏教育出版社

K827.7
65
2

王诒璧纪念集

趙櫟初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B 447734

144

王绍鏊纪念集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625 插页7 字数105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ISBN 7-5343-0239-0/I·15

定价：1.60元（压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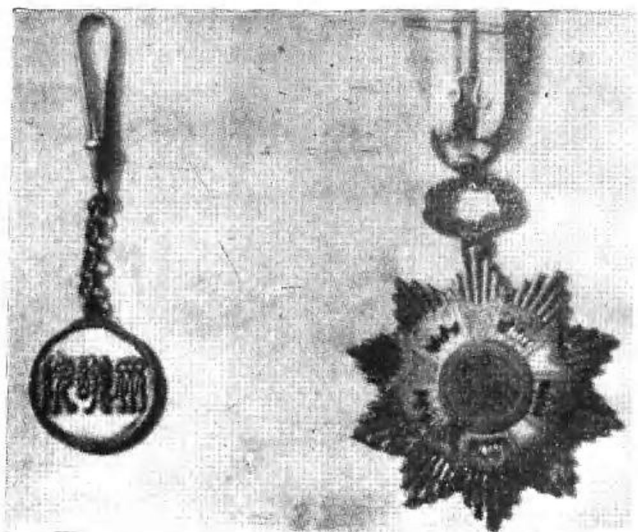
王 绍 鏊
(1888—1970)



✧ 王绍熙在吴江同里镇的故居



✧ 王绍熙去日本与母亲的合影（1908年）。



王绍鏊当选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证章（1912年）。



王绍鏊参加共和党的徽章（1912年5月）
和参加团会第一次会议（1913年2月）的纪念章。

从右起：王绍鏊、徐伯昕、
雷法琮、谭平山、
朱学范、林汉达、
严景辉的合影
(1948年5月)。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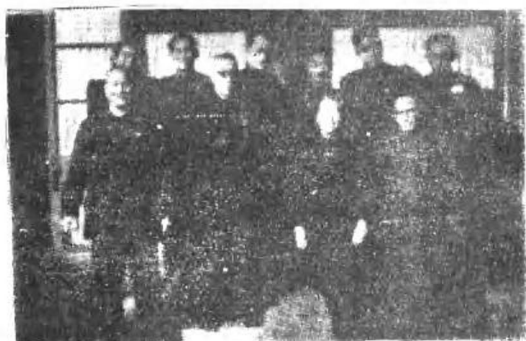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代表的合影。

前排右起：王绍鏊、许广平、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

后排右起：严景辉、徐伯昕、雷法琮、梅达君（1949年9月）。



令 王绍鏊在家中（1950年9月）。



令 王绍鏊（前排左一）和民进
部分领导同志合影（五十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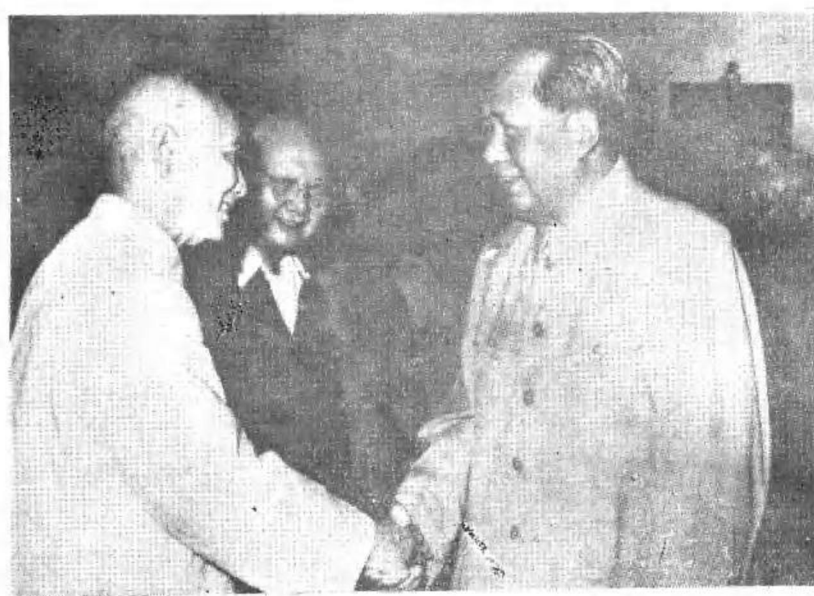


☆

王绍鏊与夫人程
铭和在十三陵水库
(1959年5月)。



☆ 王绍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 (1959年9月)。



毛泽东同志和王绍鏊亲切握手（1960年9月）



⇨

王绍鏊（前排左一）和郭沫若、李四光、包尔汉等同志（前排右起）一起参加“五一”游行（1962年）。



△

王绍鏊在民进五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1962年12月）。



△

1963年11月，王绍鏊（前排右五）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左二）、周恩来（左四）、彭真（前排右四）、邓小平（前排右三）等一起商讨国家大事。

目 录

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

忠诚战士·····	徐伯昕、葛志成、梅达君 (1)
王绍鏊传略·····	林芷茵 (7)
敝帚楼杂忆·····	王绍鏊 (48)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	王绍鏊 (67)
香港北上纪行·····	王绍鏊 (79)
忆衡老·····	王绍鏊 (81)
缅怀王绍鏊同志·····	刘人寿 (87)
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王绍鏊·····	范尧峰 (92)
我记忆中的王却老·····	侯德华 (101)
却老与太湖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金若望 (104)
忆却老二三事·····	许士汇 (112)
珍贵的友谊·····	毛安澜 (117)
永不忘怀的思念·····	倪之璞 (120)
怀念王绍鏊同志·····	陈 鲲 (124)
却老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倪耐安 (128)
安慰和回忆·····	王辅民 (130)
关于父亲的点滴回忆·····	王佩言 (139)
学习的楷模·····	王佩容 (141)

一、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

徐伯昕 葛志成 梅达君

王绍鏊同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是从为民主主义革命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一生。1970年3月31日他逝世时，我们党和国家正在十年动乱之中，我们没有机会向他表示内心的哀思；而今我国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我们的国家充满朝气的日子里，更增加了我们对王绍鏊同志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于188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字却尘，取除却尘俗、胸怀大志的意思。青年时期，他曾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因家境清贫，得亲友资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正值辛亥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就同章太炎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改为“统一党”。他曾亲去南京晋谒孙中山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的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宪法起草活动。1913年11月，北洋政府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

员资格，王绍鏊同志愤然南归。以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同志积极参加了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失败，但继续上台执政的还是北洋军阀，搞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绍鏊同志义愤填膺，毅然主张和孙中山合作。他独自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鏊同志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二十人，断然拒选。后来他又运用国会内的各种关系，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妄图强制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遭到曹锟通缉。他逃出北京后，仍然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广州国民军即将北伐时，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又遭到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人们欢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投降了敌人。而王绍鏊同志在严重困难面前，凛然不惧。在武汉时，他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小册子。回到上海，又买了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刻苦研读。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更使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他在自传里写道：从此他认识到“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因此，他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鏊同志在上海邀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了“救国协会”。他尽力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款，支援军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

组织抗日同盟军，他立刻赶去参加，表示声援。以后，王绍鏊同志还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他的上海寓所，经常宾客满座，他慷慨陈词，宣传抗日救国，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卖国反共的罪行。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1936年6月，王绍鏊同志到北方去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倒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对他施尽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营救出狱。此后，王绍鏊同志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抗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王绍鏊同志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繁重而艰险的任务，但他英勇无畏，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阴谋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并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疯狂扩大内战。王绍鏊同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此同时，加入民进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张纪元同志等还合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同志担任校长。于是这所中学就成了民进同志经常集会、商讨问题、推动民主运动的场所。

王绍鏊同志交友广泛，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有密切联系。当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同时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寓所，经常有文教界、工商界、职工界、学生界的进步朋友来往，谈论国内外形势，或商讨如何开展民主运动的问题。

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民进与上海四十七个主要的人民团体于1946年5月5日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后来发展到六十八个团体，包括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王绍鏊同志被选为联合会的理事。他对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实际的组织工作。直到一年以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1946年6月，国共在南京和谈面临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的阴谋更加暴露，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联合所属各团体在6月23日发动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盛大集会，欢送以马叙伦同志为团长、包括雷洁琼同志在内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鏊同志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他和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尽管一路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他和其他负责同志始终从容不迫地按照预定计划，步行十余里，把队伍带到复兴公园解散，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自此以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发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王绍鏊同志无不带头参加，并且主持了其中许多群众性的集会，作了鼓动人心的演讲，对推动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王绍鏊同志被迫在党的关怀下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先后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懈的斗争。同时，王绍鏊同志用秘密通讯的方式指导在上海的民进同志坚持斗争。他在给上海民进同志的信中强调：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由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政权，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这对当时留在上海的民进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更提高了大家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8年，党中央发出“五一”号召，民进在香港的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随后，王绍鏊同志和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竭智尽忠，提出有益的意见。他多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赴各地参观调查，并对民进地方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受到各地会员和群众的欢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特别强调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成就、一切作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必须紧密地依靠党的领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道路不断前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一再向党的领导建议，要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使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王绍鏊同志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生活朴素。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所以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使自己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因为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不过是剥削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装饰品，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反动阶级的政权性质。中国只